

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

决死第一纵队革命回忆录选编

第三辑

(征求意见稿)

决死第一纵队史料征集办公室编印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编 辑 说 明

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历史资料丛书，在全体一千二百余名健在同志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五年的征集与整理互作，现在将陆续编辑出书。先编成征求意见稿，经补充修改复查定稿后，再正式出版。

历史资料丛书(征求意见稿)，包括下列各册：

部队发展史、大事记	一册
军事战斗史	二册
革命回忆录	二册
组织序列表、团以上干部名册、经历等	一册
英雄模范、烈士名录	一册
文献、历史资料	二册

为使史料真正符合历史真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请接到史稿书籍的同志组织有关同志认真审阅修改，并将意见迅速反映上来，以便最后审查定稿出版。

向同志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决死第一纵队史料征集办公室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目 录

- 1、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薄一波(1)
- 2、从教五团到决死一纵队第二总队……………梁膺庸(22)
- 3、怀念时云峰同志……………梁文英(36)
- 4、上党战役中的决一旅……………侯良辅(43)
- 5、沁源人民的反占领斗争……………蔡爱卿(57)
- 6、从一个连队看我党是如何掌握
新军领导权的……………王观潮(78)
- 7、我们是如何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的模范作用的……………刘俊彩(94)
- 8、一支新式军队的成长……………温居里(106)
- 9、山西新军决死队一纵队二总队与
旧军官斗争片断……………郭万夫(114)
- 10、战斗在抗日前线的白晋武五队
……………弓庆余、尉忠信、洪星(120)
- 11、介休县的一支抗日武装……………王拱(134)
- 12、回忆洪洞游击队……………王振华(141)
- 13、关于屯留支队的回忆……………杨承绪(146)
- 14、决死一总队与太岳区人民的鱼水情……………王至诚(154)
- 15、怀念武五队中的老红军干部……………路英(164)

- 16、山西妇女战地服务团……………石 生(171)
- 17、我们是朱德青年队员……………李杰全(175)
- 18、决一旅的医疗卫生工作……………于 宁(184)
- 19、决死一纵队的通信工作……………马克绍(188)
- 20、回忆在决死队的一段艰苦历程……………张文波(191)
- 21、“铁滚”碾不碎的医疗所…… 窦效章、王 礼(201)
- 22、忆大生产运动……………张建文(207)
- 23、马蹄沟的战斗
…………… 赵瑞来、张文义、王光福、孙荣平(215)
- 24、芦家庄伏击战……………王兢业(228)
- 25、袭击刘家庄日军据点的战斗……………刘锡藩(223)
- 26、记一次反扫荡……………张鼎三(226)
- 27、铁家山歼灭战……………刘世泽(232)
- 28、活捉敌十九军军长史泽波 …… 阎守庆、宋忠贤(237)
- 29、歼灭沁县新店哨所的鬼子兵……………程远太(246)
- 30、决死一纵队三十八团一连在反扫荡中… 孙 斌(250)
- 31、痛打“满天飞”……………赵瑞来(254)
- 32、悼念彭之久同志……………何图运(263)
- 33、聂子矫和民有医院……………郝玉珍(268)
- 34、忆解文奎同志……………员 华(274)

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

薄一波

“七七事变”前夕，国难当头，华北危急，我们党在华北地区的组织又遭到严重破坏。刘少奇同志在这个紧要时刻，代表党中央，来到北方局主持互作。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大力纠正了党内“左”倾错误路线，领导各级党组织，发动广大群众，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发展统一战线，建立新军，胜利地进行了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

我们当年在少奇同志直接领导下互作过的同志，永远也不能忘记在那段艰苦斗争的岁月里，他为我们党和我们民族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一

刘少奇同志是在一九三六年春，受党中央的指派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来到天津，领导北方党的互作的。

当时，日本侵略军已越过山海关，威胁平津。蒋介石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搞所谓“华北政权特殊化”。在党的领导下，平津学生已经发动“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性群众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标志着中国革命新时期的开始。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得到广泛的响应。我们党面临着领导一场伟大斗争的历

史任务。

可是，华北地区的党组织，由于长期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损失严重，干部十分缺乏，无力进行领导。少奇同志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我们在白区除开保存了党的旗帜而外，其他的东西是很少保存下来的，党的组织是一般没有保存下来，仅仅在河北保存了个省委组织，若干城市与农村中的地方组织和数十个中下级干部。”而有些保存下来的组织，还没有摆脱“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不顾主客观条件，号召和组织党员、群众，采取严重白色恐怖情况下所不允许的斗争方式，上街游行示威，举行飞行集会，冒险进攻。一九三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北平学生举行了一次“抬棺游行”，参加游行的，都是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和很少数思想激进的青年。这是先进分子脱离广大青年采取的冒险行动，遭到敌人的镇压。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我们党很不容易积聚起来的力量，不应有的消耗掉了。

少奇同志看到这种情况，并鉴于历史教训，认为扭转局面的关键，在于恢复和建设华北地区党的组织，把这个地区党的工作引上正确路线。他明确指出：“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此时还没有传达到白区来，华北党内还是被错误路线统治着。这种错误路线（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老子天下第一，一切斗争到底，原则上否定策略路线的曲折性及在一定条件下退却防御的必要性等等），是当时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主要

障碍。很明白，不坚决肃清党内的这种错误路线，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执行，就是不可能的。”少奇同志以极大的努力，在华北地区党内彻底肃清“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他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提出华北地区党的互作方针是：坚持党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口号，准备自己，组织群众，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和阶层，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

这个正确的方针，当时受到一些同志的反对，而在北方局互作的彭真同志和林枫、徐冰同志，在北平市委互作的李葆华、黄敬同志，则表示坚决支持。为了统一党内的认识，少奇同志在北方局的《火线报》上发表了关于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文章。他写道：“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不知道向那些愿意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暂时的让步，吸引他们与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还说：

“党的策略任务，就是要用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团聚各阶级、阶层、派别，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分子和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少奇同志又用陶尚行、莫文华、胡服的笔名，在《自由评论》等报刊上发表《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和其他文章，阐述了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大多数党员、干部和进步群众，经过“左”倾错误路线不断

失败的教训，看到少奇同志的文章，对党的正确主张，普遍表示拥护。这些文章的迅速传播，使党的号召在华北地区更加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少奇同志领导北方局，用极大的力量，重建和加强遭受严重破坏的华北各地的党组织。北平、天津两个市委很快就健全了；河北省的京东、津南、保属、直南等地区的党组织都恢复了；山东省委、山西五委和河南五委也先后成立起来；还根据中央交给的任务，派干部到华中、华南一些地区协助恢复党的组织。一年多的时间里，华北地区的党员，发展到五千多名。党领导下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了。由华北的一些进步团体发起，又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平、津为活动中心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很快扩展到全国的大中城市。在华北地区，北平、天津和各省出现了大批宣传队、戏剧队、歌咏团和下乡互作队等等，抗日救亡运动迅速活跃起来。

党的正确主张，也影响到国民党军政系统的上层人物。当时，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多次命令驻北平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撤退到保定。宋犹豫不定。少奇同志亲自起草了主张抗日救国的三条意见。通过二十九军的一位参谋长作为自己的意见拿给宋看，宋认为很好，就没有执行撤退的命令。那时候，北平的爱国学生还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少奇同志派人劝大家改喊“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

不久，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广大爱国官兵就转上了同情抗日救亡运动立场。

从一九三六年春到“七七事变”，只有十几个月的时间，少奇同志果断地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使党组织恢复和发展了，党的领导加强了，群众发动起来了，抗日统一战线互作开展起来了，创造了党在白区互作中前所未有的成绩。党中央对北方局的这段互作，评价很高。当时中央书记处在给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一封信上说：“我们认为北方党的互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的转变”，“这些主要转变，足以奠定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

在少奇同志来到北方局互作的时候，我和一些同志还被关在北平的国民党监狱里。狱中的党支部，组织我们学习了一九三五年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同志的报“，又学习了少奇同志的文章。大家注视着华北和全国出现的新形势，看到了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经过艰苦奋斗和多次挫折之后，重又展现出广阔天地和胜利曙光！

二

当时，摆在华北地区党组织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坚决执行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互作，广泛发动群众，壮大进步力量。在这一互作中，既要团结反日基本力量，又要通过谈判、协商和必要的妥协、让步，争取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可能合

作的分子。于是，北方局把当时可能抽调的干部都陆续派往华北各省市。我和几位同志一起被派往山西。

一九三六年八月下旬，我刚从监狱出来，阎锡山的代表来见我，拿着阎的电报，邀我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我过去一直做党的秘密互作，没有做过上层的统战互作，也不愿意同阎锡山打交道，所以婉言谢绝了。

过后，把这件事报告了北方局。第二天，徐冰同志来告诉我：“胡服同志说，机会难得，要去！”又告诉我，少奇同志还指出：“不想去，大概还认为我们不能同阎锡山合作抗日，只应当做基层群众互作，不应当搞上层互作，这也是对形势认识不足。一定要看到，现在形势正在发生大的变化，日本要灭亡中国，蒋介石继续搞不抵抗主义，阎锡山在动摇中。当前，党的任务是，既要搞好基层群众互作，又要搞好上层统一战线。阎锡山找你去，是个好机会；找上门来，不去，就失掉了这个好机会”。

九月，我来到太原，找到做地下互作的同志，并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包括一个同阎锡山历史渊源很深的老军阀，进行了四十多天的调查研究，对山西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深深地体会到少奇同志对形势的估计和提出搞好上层统一战线互作的要求，是非常正确的。随后，我见到了阎锡山，表示回山西帮助搞抗日救亡互作，还要同远方朋友商量。阎锡山完全意识到我是要向党组织请示的，表示理解。我返回北平作了汇报，北方局分析

了山西的情况和阎锡山的动态，研究了今后的方针。

阎锡山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封建统治者，是个地方实力派。在山西经营了二十多年，在“山西实业公司”的名义下，办了三十五家企业，修了同蒲路，还有银行、钱庄之类。他的家当和他的势力都在山西。他总是要千方百计保住这些的。当时，阎锡山处境十分困难，经济破产，民怨沸腾，统治摇摇欲坠。日本侵略者向华北步步紧逼，山西不可避免要遭到日军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和日本侵略者的矛盾，就成为主要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随着日军的进逼而激化。

与此同时，阎锡山还有同蒋介石的矛盾。在反共这一点上，虽然他们是一致的，但蒋介石一直想吃掉山西，一面暗地里策动河东道独立，一面收买阎的高级军官，挖山西的墙脚。在这种情况下，阎和蒋的矛盾也激化了。

这时，在阎看来，降日、迎蒋都不是好办法，抗日、拒蒋又没有力量，他不得不寻找暂时的同盟者，借用我党的力量。一九三六年红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使阎锡山感到共产党也是一个很大威胁，同时，他又看到共产党要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认为联共可能还是一条出路。在他的头脑里，联共和反共是并行不悖的，只是次序先后和分量轻重的问题。于是，想出了一条计策，就是打起抗日的旗号，用上一批共产党员，仿照共产党的办法，采取某些暂时性的进步措施，扩充实力，去对付日本人和应付蒋介石，同时和共产党周旋，目的是保

持他对山西的统治。阎锡山说过：“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但是，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只有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都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我是用共产党的办法削弱共产党。”

尽管阎锡山有自己的打算，对抗战是动摇的、不彻底的，但是，他表示愿意抗战和同我们合作，这一点还是好的。因此，北方局认为，应当从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积极地争取他、推动他抗日，并且通过合作来发动群众，壮大进步力量。少奇同志提出对阎锡山的方针是：与阎合作抗日，并且开展群众运动，同时又要提高警惕性，随时都戒备他来反对我们和群众；要尽可能地通过阎的组织形式，例如“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去进行互作，但又不受他的框框的限制。

经过分析研究，北方局认为在山西大有可为，决定加派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同志同我一起，第一批去太原。临行前，徐冰同志传达了少奇同志对我们的指示：一、这次到山西去，首先要争取站稳脚跟。不要搞“左”倾冒险主义和空谈主义，不要提阎锡山根本不能接受的口号，不要怕到上层机关去和戴“官办团体”的帽子。二、要踏踏实实地做群众互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能做“清客”，不要“抬轿子”，要争取抗日民族革命的领导权。三、决定成立做山西统战互作的互作委员会，直接受北方局领导；同时成立山西互委，由张友清同志负责。党的公开互作和秘密互作完全分开。

党的公开互作要为党组织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到了太原，我们就同阎锡山正式谈了一次。

我们提出：第一，宣传共产党抗日救亡的主张，不应受到限制。第二，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东西，我们都做；不利的东西，我们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应给予方便，对于我们用的人，要保障安全。当时阎锡山一一表示同意。

为了便于发动群众，我们的互作一开始，就接过了阎锡山的“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这个组织，名义上阎锡山还是“会长”，实际上领导权很快转到我们手里。我们把它适当加以改组，加强进步因素，扩大群众基础，通过它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我们按照少奇同志提出的抓实权，做实际互作，反对空谈主义的方针，制定了牺盟会的行动纲领，迅速把互作开展起来，在五厂（包括兵工厂）、学校（包括军事学校）和农村，广泛发展牺盟会组织。为了迅速培养干部，我们在“山西军政训练委员会”的名义下，办起了“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军政干部训练班”、“牺盟会特派员训练班”、“民政干部训练团”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等，把山西当地的和全国各地来到太原的成千上万进步青年吸收进来，加以培养训练。这些训练单位，实际上成了我党的军事政治干部学校，造就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应当提到，经过培训的牺盟会特派员，都是比较优秀的党员，派往各县互作，同时担负着党组织交给

的建党任务。

牺盟会互作的迅速开展，引起了顽固分子的惊慌。阎锡山的亲信、十九军军长王靖国，带领反共团军官七、八十人，向阎锡山请愿要求解散牺盟会，驱逐共产党，阎锡山对他们说：你们目光短浅，看不到前途。

在少奇同志提出的正确策略原则指导下，在实际互作的过程中，我们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在阎锡山的眼里，我们是共产党员，但又不是共产党的正式代表，而是他请来帮助做抗日救亡互作的，用的是他的形式、他的口号，戴的是“山西帽子”，搞起来的组织还是他的。而对我们来说，则是利用合法形式和“官办组织”积极开展互作，推动阎锡山抗日，壮大抗日救亡的力量。

三

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少奇同志和北方局先后来到太原，直接加强了对山西党的互作的领导。

少奇同志来到后，立刻向我们传达了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北洛川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他指示我们不要放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要用极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他向我们指出：一年来，你们在山西站住了脚，打开了局面。但是，一定要看到，现在抗战开始了，全国的政治形势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过去是准备抗战，现在是实行抗战，而且要从单纯的军队抗战过渡到

全面的民族抗战。因此，在我们的策略上应当有所改变。要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放手发动群众。“左”倾关门主义还是要反对的，但是主要的注意力应该放在防右上。当形势不利于我们前进的时候，要善于等待，不要冒险前进；但当客观形势的发展，是来潮，是高涨，就不要再等待，就要大胆地前进。现在，要按照洛川会议精神，努力使自己成为抗战的核心，不怕打破阎锡山的框框，要确实掌握领导权。只有我们的力量壮大足以控制局面，合作才能持续下去。他批评我们当时的做法还不够放手，还有包办群众运动的味道。少奇同志后来还一再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反对迁就主义的“一切经过”。他说过：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说过：刘少奇同志说的很对，并且强调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由于少奇同志的正确指导，使得山西的统战互作，在形势转变的关键时刻，没有迷失方向，并且很快开创了新的局面。

少奇同志还给牺盟总会的负责干部包括非党干部公开作了一次报告，分析了抗战开始后的形势，要求牺盟会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号召学生、知识分子脱下长衫子，换上短布衣，到农村去。他还亲自起草了《山西农会章程》，用牺盟会的名义发布，使党和一切进步团体都能利用这个章程，合法地去发动农民群众。

在这期间，我多次听过刘少奇同志的讲话，深受教益。山西的互作所以少走了一些弯路，这同少奇同志的及时帮助和指导是分不开的。我们在思想上互作上都有过一些偏差，比如：开始时，我有过不愿搞上层统战互作的关门主义思想；局面初步打开后，我们没有及时打破阎锡山的框框放手去开展互作，这都是经过少奇同志指出后才得以纠正的。后来，他又纠正过我的一次“左”的行动。当时国民党复兴社在太原办的《华闻晚报》，久为群众所不满，雁北失守时谎报军情，我就抓住这个机会让群众把它捣毁了。少奇同志得知后，严肃批评我说：这是违反统一战线原则的，群众的“左”并不可怕，也不难纠正；但是，作为领导者，如果认为只有用这种“左”的指导方针、“左”的行动才能发动群众，那就是错误的。

少奇同志在太原还同阎锡山的代表梁化之见了面，谈了话。他着重地向梁说了下面一段话：牺盟会是共产党帮助发展起来的。发展统一战线，是为了抗日救亡，为了中华民族，不是为私利，不应有谁挖谁的墙脚的问题。我们之间是可以长期合作的。在统一战线中，阎先生是会发展的，共产党当然也要发展，限制我们的发展那是不行的。少奇同志明确有力的谈话，缓和了阎锡山的疑虑，也大大方便了我们的互作。

一九三七年秋，雁北失守，太原深受威胁。正在这个时候，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领八路军一一

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东渡黄河，挺进华北前线抗日。这对山西以至整个华北地区抗日军民是个极大的鼓舞。在党的领导下，以八路军为骨干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成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地方武装，使敌后根据地很快就建立和发展起来了。

八路军在挺进。山西旧军在日本侵略者进攻面前，却一触即溃。阎锡山虽然枪毙了他的军长李服膺，也未能阻止溃败之势。这时，阎对旧军已逐渐失去信心，于是，就来找我们帮他的忙。根据党中央历来指示的精神，我对阎锡山说：看起来仅仅依靠旧军是不行了，有必要赶快组织一支新军。阎锡山也有组织新军的想法。他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要先搞一个团，试试看。我当即向少奇同志报告了这件事，他说：好，赶快去！要抓枪杆子，一个团也要搞。并决定由牛荫冠同志接替牺盟总会的领导工作。

一支实际上受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山西新军，很快就诞生了。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一总队成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新军不断壮大。决死队发展到四个纵队，五人武装自卫队从团发展到旅，又发展了三个政治保卫旅和一个暂编师，不算牺盟会在各地的游击队，有正式番号，列入正式建制的有五十个团，实际的兵员和武器数量都超过了当时的旧军。

少奇同志当时向华北地区党组织提出两条：一是动员平津和华北各大城市的青年学生到农村去；二是在三个